

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探析 ——以中东为例

陈 静

(福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实现其反恐战略的重要步骤,然而战争并未遂美国之愿,相反,催生了新一轮恐怖袭击高潮。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袭击主体基层化、范围扩大化、形式复杂多样化、危害民众化的新特征。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其直接原因是全球范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抬头所致。面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既要反恐又要反霸,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反恐合作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6)05-0069-06

美国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实现其反恐目的,反而刺激了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触发了新的恐怖袭击高潮,伊拉克甚至成了恐怖主义的“天堂”。伊战后不仅全球恐怖袭击的数量增加了^①,而且恐怖主义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模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国际社会应高度关注与应对。

本文以中东为例,探讨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成因及反恐原则。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所说的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某些个人或集团具有某种政治和社会等目的,在国际上针对特定的机构或个人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袭击及威胁,或者为了制造恐怖主义气氛以致有目的地滥杀无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国际恐怖主义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包括第三国国民通过或者教唆罪行发生地国国民进行犯罪”^[1]。

一、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

(一)恐怖袭击主体基层化

阿富汗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高压下,大部分恐怖组织的高层几乎销声匿迹,而基层恐怖分子则作鸟兽散,世界暂时得到了平静。然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恐怖分子得到重聚的机会,战争一结束,恐怖袭击便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这些袭击更多的是依靠事件发生地的恐怖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的主体基层化趋势明显加强。恐怖组织的高层通过提供训练、资金和信仰来支持基层组织。这种作为“信仰对象”的高层比作为恐怖架构的高层更可怕,因为它能带动一大批追随者。参与策划和组织恐怖袭击的基层与高层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基层恐怖组织自行策划和实施对敌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恐怖组织的高层最低限度地直接参加恐怖行动。这样一来即使有些组织成员暴露被抓获,对整个组织也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保护恐怖组织高层的安全。这两

收稿日期:2006-05-29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JA04074S)

作者简介:陈静(1973-)女,重庆人,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东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年,几次“基地”组织重要成员被抓获,但并未得到很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其原因就在这里^[2]。恐怖袭击主体基层化导致恐怖行动越来越迅捷,恐怖主义活动也日益增多。对于受害国来说,预防恐怖袭击的难度更大了。世界也并不像布什所说的更安全,而是更加惶恐不安。

(二)恐怖范围扩大化

美国绕开联合国、一意孤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使国际反恐偏离正确轨道,从而给以“基地”为首的恐怖组织喘息之机,恐怖分子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正在力求开辟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伊战之前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主要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2002年印尼巴厘岛等地区爆发的针对美国的恐怖爆炸为标志),现已扩大到与美国“走得近”的国家(如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日韩、约旦等亲美国国家)。由于美国加强了反恐措施,加大了恐怖袭击的难度,因而恐怖分子就将它们对美国的仇恨转嫁到亲美国国家头上,而美国的盟友在美国的旗帜下积极参与伊拉克事务,正好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提供了契机。以“基地”为首的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的盟友,其目的是想摧毁美反恐战线的外围。2003年11月伊斯坦布尔大爆炸、2004年4、6月日韩公民在伊拉克遭绑架、2004年10月西奈半岛爆炸案以及2005年约旦“11·9”大爆炸等一系列国际恐怖事件都是明显的例子。恐怖主义活动扩大化甚至威胁到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机构的安全,如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发生爆炸,造成百余人死伤,特使德梅洛遇袭身亡。

(三)恐怖形式复杂多样化

伊战之前,恐怖分子为达到一定目的,往往采用暗杀、劫机、爆炸等手段来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难以消除的恐怖威慑。而伊战之后,恐怖分子给社会造成威胁的方式变化多端。一是采用“连环”爆炸的方式。在一次事件中同时袭击两个或多个目标,让政府应接不暇。2003年5月12日沙特利雅得爆炸案、2003年11月15日伊斯坦布尔爆炸事件、2004年10月7日埃及塔巴爆炸案、2005年伦敦“7·7”大爆炸、2005年7月23日埃及沙姆沙伊赫大爆炸以及2005年约旦“11·9”大爆炸等均属此类型。二是实施“语言恐怖袭击”。“语言恐怖袭击”就是故意散布虚假的恐怖信息,这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恐慌心理,因此带来的危害更是无法估量。伊战之后,美国经常得到有关“基地”组织将要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袭击的信息。美国目前在国内安全戒备方面已是草木皆兵,为此付出了巨额的经济代价。美国花费大量精力保护其本土免遭袭击,但对海外人员和资产的保护却显得鞭长莫及。只是恐怖分子发出威胁时,就关闭海外高危地区的使领馆。三是恐怖手段高技术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大大便利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俄罗斯别斯兰中学劫持人质的恐怖行动就是车臣恐怖组织头目利用卫星通信手段组织实施的。在马德里火车站,袭击者仅用

10个背包便造成1700多人死伤^[3]。四是采取绑架和杀害外国人质的方式促使人质所在国满足自己的要求。恐怖分子在伊战后频频采取绑架和杀害外国人质的方式逼迫盟军和外国公司撤出伊拉克。伊战以来,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外国人在伊拉克遭绑架,其中至少有30余人已证实被害^[4]。

(四)恐怖危害民众化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克拉克认为,“目前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中有一半多、伤亡者当中有90%是‘随意选取的平民’而不是军队、政府或商界人士”。^[5]这表明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袭击的目标,除了针对政界、商界、军界等要人外,更多地指向无辜民众。与早年恐怖分子信奉的“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的信条不同,当前恐怖分子崇尚的是“不仅要更多的人看,而且还要更多的人死”的理念。拉登曾声称:“我们对穿制服的人和平民不加区别,他们都是我们袭击的目标”。^[6]伊战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造成民众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据统计,2002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造成10112人伤亡,2004年升至15923人,2005年进一步升至19896人^[7]。而伤亡者中,大多数是无辜民众。恐怖分子针对民众发动袭击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恐怖分子对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实施恐怖袭击日益困难,因而把袭击目标转向无辜民众。二是恐怖分子由于绝望和仇恨,丧失理智,对他人乃至自己的生命都毫不怜惜,不断使用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实施同归于尽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三是恐怖分子为了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在他们看来,攻击一定范围的无辜民众,恐慌的将不仅仅是特定的人群,而是全社会各个阶层,甚至相关的很多国家。显然,这正是恐怖分子所企求的。

二、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分析

国内学者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已有诸多论述,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个方面。^②显然,伊战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笔者以为,最为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美国发动的以“反恐”为旗号的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泛滥

战争与恐怖主义往往相生相伴。二战以来,中东地区战争频繁,如由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引发的五次中东战争、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由苏美先后发动的两场阿富汗战争等。中东地区爆发的这些战争常与恐怖主义交织一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各国严厉打击下,中东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遭到很大削弱。“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大气候以及各国竭力围堵打压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不仅“基地”组织遭到重创,而且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都“伤筋动骨”,但美国发动的以“反恐”为旗号的伊拉克战争却引起恐怖主义势力极大的反弹。国际社会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形,伊战之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就曾告诫:“伊拉克战争将产

生100个本·拉登”^[8]。马来西亚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在伊战爆发之前也曾指出,如果美国对伊动武,将引发穆斯林要求政府对美国 and 参与战争的国家采取行动,同时也增加参加圣战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9]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伊斯兰教领袖还先后警告美国:对伊开战可能出现更多恐怖袭击,美国将永无宁日。^[10]对国际社会的多次忠告,美国都置若罔闻。伊拉克战争再一次证明“暴力只能激起更加猛烈的反抗”这一规律,伊拉克战争间接地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争取同情者和招募成员提供了便利。“基地”等恐怖组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基地”的一些骨干分子甚至还秘密潜入其他国家,成为这些国家恐怖组织的骨干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火种”,不断以“革命”和“圣战”为口号,发动恐怖袭击,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活动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伊战后美军“虐囚”和亵渎《古兰经》事件的频频曝光,使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沙特、埃及、土耳其和约旦等亲美国国家频繁发生针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不断出现劫持外国人质且将人质斩首的场面,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最危险、最血腥的地方。2004年全球32起劫持绑架外国人质事件中有22起就发生在伊拉克^[11]。

持续增加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不仅针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英两国,就连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国家也未能幸免。2004年马德里“3·11”爆炸事件就是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政府的回应;2004年9月袭击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的恐怖事件,其直接目标也是针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澳大利亚;泰国由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其南部频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背后的黑手就是与“基地”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祈祷团”、非南部的“摩洛哥伊斯兰解放阵线”等恐怖组织。

(二) 美国“民主反恐”的方式催生了更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9·11”事件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决策上风,他们认为少数“无赖国家”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反对与仇视是发生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内在原因,只有把这些国家改造成民主自由国家,才能根本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土壤。受其影响,布什将“民主改造中东”看作是中东实现反恐目标的一剂良药。2003年2月布什提出“民主改造中东”的思想,将推翻萨达姆政权从而建立“民主榜样”作为重要开端。2004年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大中东民主化改造”计划^[12]。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化改造”计划并非一场“政治秀”,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战略意图,该计划的实质是要使对象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转变,共同完成改造“大中东”地区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

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和强行改造中东地区的举动,触动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体制和文化价值观,被认为是要改造已经过一千多年传承的伊斯

兰文明,两类价值体系“相撞”势必酿成“文明的冲突”,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混乱。此外,美国在中东“民主改造”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以及对中东政治体制采取矛盾态度(以前支持该地区的专制政权,现在要让其民主化)的做法,使更多的中东人民把美式民主与美国的霸权扩张等同视之,从而进一步激化了中东民众的反美情绪。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阿拉伯—美国协会2004年6月对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3300位民众进行的调查,和2002年相比,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好感急剧下降。在埃及,这一比例仅占2%。^[13]可见,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使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恨美国,因为“他们不接受美国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接受美国通过民主改造来根除恐怖主义威胁的逻辑”^[14]。国际恐怖分子、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伊拉克反美武装更不愿意对美国这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忍气吞声”,于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大幅度上升。2005年沙姆沙伊赫爆炸事件的制造者公开声称是针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称要惩治所谓的“穆斯林叛徒”。

“美式民主”难怪中东人民反对,其实通过民主改造实现反恐目的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脚。即使那些实行民主的国家,仍未逃脱恐怖主义带来的厄运(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鉴,在2000—2003年间,全球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有269起发生在“自由之家”所界定的“自由国家”,119起发生在“半自由国家”,138起发生在“不自由国家”^[15]。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闻名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恐怖主义在自由国家比不自由国家更加普遍”^[16]。这表明,一国恐怖主义发生频率与该国民众的自由程度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就伊拉克而言,尽管目前其民主化进程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但它并未有效减少恐怖袭击活动,相反,恐怖主义活动还呈上升趋势。被美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的崛起令那些试图以强力推进中东民主改造来削弱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美国陷入尴尬境地。美国学者奥利维尔·罗伊认为布什政府认定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最佳办法,已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假设基础之上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错误假设就是,全球的恐怖主义根源在中东”^[17]。

(三) 伊战后阿以冲突这一地缘政治特点的变化助长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蔓延

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失去了伊拉克这个最坚定的反以、反美国家,不仅如此,在伊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反以、反美的另一象征利比亚“向美‘服软’,并前所未有地对夙敌以色列展开秘密外交”^[18]。这使巴勒斯坦失去了最大的外部支持,“以强巴弱”态势更突出。中东伊斯兰国家整体力量进一步弱化,进入与以对抗半个多世纪以来最软弱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赢家,美推翻萨达姆政权为以色列除掉了劲敌,使以色列更有恃无恐。沙龙政府利用全球关注伊拉克问题

之机,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执意修建隔离墙。以色列捞取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及时搭上美国的“反恐”便车,将巴勒斯坦问题与反恐问题挂钩,空袭叙利亚境内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受训的营地,并对“哈马斯”等巴“恐怖”组织展开全面的“反恐战争”(炸死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兰提西;挨家挨户地搜捕“哈马斯”成员,摧毁巴“恐怖”组织所有基层机构;摧毁巴激进组织兵工厂;从巴银行夺走大量现金,切断用于支撑“恐怖”组织的财源)。巴勒斯坦认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是“国家恐怖主义”,因而更刺激了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报复行动。布什不但不批评以色列当局,反而公开宣布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表示以色列有权防卫自身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此时“巴勒斯坦问题在布什眼中,变成反恐问题”^[19]。

以色列和美国的上述做法为各类恐怖组织打击美以提供了口实,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为恐怖主义活动的盛行火上浇油。许多穆斯林青年正是在观看枪杀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电视画面后才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本·拉登也正是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来号召穆斯林对美以发动“圣战”的,其它恐怖主义势力也借机不断壮大自己并制造针对美以的恐怖主义活动。

三、反恐原则

伊战之后,面临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如何有效反恐已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共同难题。笔者认为,实现有效反恐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一)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应坚决反对以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的霸权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大全球性难题,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异端,国际社会应该群起而攻之,但在反恐过程中,要警惕某些国家以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的做法,坚决反对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犯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霸权主义行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恐怖主义作辩护。事实上,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同属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祸害。两者往往紧密相连,一方面,恐怖主义泛滥为超级大国谋求霸权提供了借口,刺激了霸权主义的进一步膨胀;另一方面,霸权主义本身又是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学者W·伯顿在所著的《全球冲突》一书中指出:“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制度内在缺陷‘外溢’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滋长的重要原因,这种‘外溢’不仅表现为大国扩张带来的其社会经济制度缺陷的扩散,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其国际战略和国际政策,表现为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甚至是对别国某种恐怖组织的支持”^[20]。法国思想家博德里拉尔德在其著作《恐怖主义精神》中更是精辟地分析道:“造成这种残酷报复行为的是霸权体制本身”^[21]。

如果允许霸权主义有权以反恐之名发动战争,那么恐怖主义就会自己给自己赋权以反霸之名发动恐怖袭击。同时,以霸权主义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达到反恐的目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对美国

政府的反恐战略提出强烈批评。她说:“用美国政府现在的反恐方式反恐,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安全,反而感觉自由受到限制”^[22]。

(二)尊重文明多样性,避免把反恐矛头针对某一文明或宗教本身

某些西方学者指出,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有关,伊斯兰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烈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代表。^[23]2003年,美国国务院所认定的35个“外国恐怖组织”中,有22个不同程度地与伊斯兰有关;而且美国的“反恐战争”几乎全部指向这22个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塔利班、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政权。^[23]这给国际社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有关,反恐就是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恐怖主义。对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虽然恐怖主义包含着文明和宗教的因素,但不等于说它来源于某一特定的宗教或文明,主观臆断地将某一文明或宗教作为假想敌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在中东地区生长的恐怖主义,许多情况下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文明的不尊重、不理解造成的。正如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所说:“我们受到的一个诱惑依然是通过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伊斯兰教。与少数异见者的偏颇行为和被扭曲变态的声音而使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被恶魔化,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的威胁”^[24]。

因此,反恐必须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必须将反恐与民族和宗教问题区分开来,特别是不能给所有穆斯林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免使反恐战争变成文明冲突,人为制造“文明冲突假象”将激发更激烈的对立和反感,最终为恐怖组织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土壤,致使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和怪圈,完全背离反恐的初衷和方向。国际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共同敌人,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文明联盟”,以便使全球不同信仰的公民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2004年亚欧首脑会议通过的“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特别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提倡促进文明间对话与交流,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25]。如果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得以推广和深化,其意义将会超越文化和文明的范畴,对解决国际恐怖主义这类“政治艾滋病”具有不可取代的效用。

(三)反恐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在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独应对恐怖主义和众多的局部冲突,更不可能单独保障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如果说伊战前国际反恐还是一整盘棋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反恐联盟出现分裂和弱化。因此,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其一,必须尽快统一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这是进行有效国际反恐合作的基础。一个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既有助于避免一些国家借反恐实现自身战略图谋,也有助于阻止恐怖主义组织力图拥

有合法地位的企图,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大幅度减少恐怖主义行为。受不同历史传统、国家利益、价值观的影响,世界各国在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这样就缺乏合作的基础,很难有效展开国际反恐合作。南非前副总统祖马曾呼吁国际社会严格“恐怖主义”定义,以确保反恐斗争取得更有效的成果。^[26]从目前来看,美国基本掌握了定义恐怖主义的主导权。美国把所有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暴力活动都定义为恐怖主义,而对于其他国家境内反政府、反人民的暴力活动则视美国的利益关系而定。例如美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伊拉克、北朝鲜、伊朗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中,美国公然袒护车臣恐怖分子而批评俄罗斯政府。美国垄断恐怖主义定义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巩固的反恐联盟,而是为了实现至高无上的美国利益。美国的这些做法是不得人心的。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强调指出:“某些国家在没有得到国际认可的解释之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是无法接受的,大国也不应该将它们观点和定义强加于别国”。^[27]如何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联合国法律顾问科瑞尔曾说:“法律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但这个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28]因此,在定义恐怖主义时需要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充分发挥其政治智慧。

其二,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反恐合作。目前国际反恐合作主要集中于军事、情报和技术等领域。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和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上分歧较大,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际反恐合作虽有进展,但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各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过重点应该是政治和法律领域。在反恐政治合作上,各国政府要超越意识形态,摒弃反恐的双重标准,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不能让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和霸权主义左右和戕害国际反恐合作进程。此外,还应争取各种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机构),甚至各国民众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使其成为国际反恐战线的盟友。在反恐法律合作上,各国之间应相互支持,特别是在引渡罪犯方面应加强配合。进一步巩固反恐合作的国际法基础,扩大现行国际反恐条约参加国的范围。此外,发达国家还应在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从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反恐合作援助,加强其反恐设施,训练其反恐力量,而不要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其三,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主导作用。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共制定了12项反恐国际公约,为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9·11”事件后,联合国在反恐中的权威作用被不断削弱,特别是在反恐联盟的领导权问题上,美国和联合国出现了严重分歧。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经历了美国谋求联合国支持——抛开联合国——回归联合国框架三阶段的变化,美国选择进入还是摆脱“联合国框架”取决于其对

合作收益的评估。就是美国与联合国的反恐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器物”层面的,这种合作重视联合国的“工具”价值。美国这种盛气凌人的做法和对待联合国的实用主义态度遭到国际社会一致批评,难以担当领导国际反恐联盟的大任。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唯一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政治权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就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联合国今天不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创造一个出来”^[29]。因此,加强联合国在反恐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才能形成强大的威力,才能建立有效、公正、全面的全球反恐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打击恐怖主义。

四、结语

早在1962年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曾预见到21世纪将发生全球范围恐怖主义战争,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恐怖主义战争”,现在看来这并非危言耸听。伊拉克战争之后,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以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目标,掀起了新的恐怖袭击浪潮。如果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联手向文明社会发起挑战,谁会否认新的战争会爆发?而且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必然具有全球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对此,国际社会应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注释:

- ①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事件260余起,比2002年增加45%(参见《纵论国际战略形势》,《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第4页)。2004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事件336起(参见《2004年的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形势综述》,《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2期,第1页)。2005年1月至11月底,共发生国际恐怖事件360余起(参见《2005年国际安全形势的回顾与展望》,www.studytimes.com.cn,2005-12-27)。
- ②参见胡联合著,《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杨洁勉著,《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时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 ③如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根源,从而在实质上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根于伊斯兰文明的反西方文明性质”(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说得更直率,认为“伊斯兰教是主张暴力的宗教,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危害最烈的恐怖主义”(参见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02, P. 1)。

参考文献:

- [1]杨洁勉,赵念渝. 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5.
- [2]美国宁. 未来10年国际反恐斗争不可能结束[J]. 瞭望东方周刊,2004,(11):18.
- [3]DOUGLAS J FEITH. U. S. Strategy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 [R]. Political U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4. 9.
- [4] 李意. 试析中东国家的非传统安全挑战[J]. 阿拉伯世界, 2005, (3): 12-15.
- [5] 王亮亮. 2005年的世界[EB/OL]. <http://chinadaily.com.cn>, 2004-12-23.
-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中心. 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17.
- [7] 张家栋. 2005年世界恐怖活动评析[J]. 国际问题研究, 2006, (2): 52-53.
- [8]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 反恐背景下的美国全球战略[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4.
- [9] 付昱. 马来西亚副首相抨击伊拉克战争[N].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3-03-05(2).
- [10] 李晨阳. 伊拉克战争对东盟的影响[J]. 东南亚纵横, 2003, (7): 1.
- [11] 李伟. 2004年的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形势综述[J]. 国际资料信息, 2005, (2): 4.
- [12] ROBIN WRIGHT AND GLENN KESSLER. "Bush Aims for "Greater Mideast" Plan; Democracy Initiative To Be Aired at G-8 Talks[R]. The Washington Post, 2004.
- [13] 安维华. 美国两场“反恐战争”与帕西地缘政治[J]. 国际政治研究, 2005, (1): 81.
- [14] ZBIGIEW BRZEZINSKI. The Wrong Way to Sell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R]. The New York Times, 2004. 19.
- [15] F GREGORY GAUSE III.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J]. Foreign Affairs, 2005. 8.
- [16] 保罗·R·皮拉尔. 恐怖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 265.
- [17] 奥利维尔·罗伊. 反恐战争: 模糊的使命[N]. 美国洛杉矶时报, 2005-09-11(2).
- [18] 黄培昭. 中东不跟美国来硬的[N]. 环球时报, 2004-01-16(14).
- [19] 宋明江. 世界格局之争中的机遇与挑战[C].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3. 286.
- [20] 约翰·W·伯顿.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39.
- [2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中心. 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的理论探索[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280.
- [22] 刘瑞常. 著名政要批评美“单边”反恐[N]. 辽宁日报, 2005-03-11(2).
- [23]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114.
- [24] J·L·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4.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钱其琛在“马德里俱乐部”峰会上的讲话[EB/OL]. www.fmprc.gov.cn, 2005-03-11.
- [26] 高原. 防止浑水摸鱼, 南非呼吁严格“恐怖主义定义”[EB/OL]. <http://xinhuanet.com>, 2002-01-04.
- [27] 孙晓慧. 黎总统呼吁准确定义“恐怖主义”, 反对美单方解释[EB/OL]. <http://chinadaily.com.cn>, 2004-01-13.
- [28] 阿甘. 联合国全球反恐协定: 恐怖主义定义成为分歧[EB/OL]. <http://army.tom.com>, 2001-11-06.
- [29] KIM R HOLMES. The Future of U. S. —UN Relations[R]. the XXI German American Conference, Germany, 2003.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fter Iraq War ——Taking the Middle East as Example

CHEN J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Iraq war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realizing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 strategy, but it failed, causing a new terror raid climax. After Iraq wa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s new features, such as magnifying of the sco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hape et al. The direct reason of the rampant of terrorism is the rise of power politics and hegemonism.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rampant terrorism, the world must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as well as oppose hegemonism, respect pluralism of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radicate the root of terrorism jointly.

Key words: Iraq wa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overflow; anti-terror cooperation